

主 编 王秉忠

副主编 孙玉珍

马越山

赵冬晖

081551

目 录

-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秉志 (1)
-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原因探讨…………… 庄 严 (14)
- 长春的沦陷及其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中心…………… 霍燎原 (23)
- 伪满政权傀儡性之再认识…………… 张辅麟 (34)
- 剖析伪满政治体制诸特点…………… 陈志德 (47)
- 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殖民地的“民族政策”
…………… 王希亮 (58)
- 满铁调查部述略…………… 刘永祥 (70)
- 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 苑 红 (80)
- 张学良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王 驹 卞直甫 (88)
-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
工人反日斗争…………… 安振泰 (98)
- 论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流亡政治集团…………… 张德良 (107)
- 流亡关内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述略…………… 宿丰林 (120)
- 江桥抗战的经验教训…………… 孔令波 (131)
- 东北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 聂月岩 (141)
-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丧失的历史原因…………… 宋世章 (152)
- 试析东北抗联遭受挫折之原因…………… 赵俊清 (161)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作战指导思想与作战方法的演变
…………… 彭可时 (172)
- 论冀热辽“无人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邓一民 刘小鹏 (182)

| | |
|-------------------------------------|---------------|
| 抗日义勇军袭击南满铁路战斗举例——资料 与评述····· | 赵冬晖 (193) |
|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 | 步平 (204) |
| 关于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经济性质问题的探讨 ····· | 李作权 (214) |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民 族金融业的摧残····· | 孙玉玲 (224) |
| 日伪经济“统制”下的东北民族工商金融业 ····· | 王颖 (235) |
| 东北沦陷时期对苏贸易的衰落····· | 杨玉林 (243) |
| 日本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二十年百 万移民计划”····· | 孙继武 郑敏 (257) |
|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研究····· | 刘金库 (269) |
|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攫取东北路权····· | 马越山 (279) |
| 王卓然的抗日救国活动····· | 武育文 苏燕 (288) |
| 一个被忘却了的人——傅世昌····· | 孙继英 (301) |
|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九·一八”事变 ····· | 李茂杰 张学成 (313) |
| 郑孝胥的“王道思想”剖析····· | 赵聆实 (325) |
|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景惠····· | 张玉芝 (336) |
|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区对报业的摧残与统制 ····· | 张贵 张铸 (344) |
| 沈阳东大营沦陷小史····· | 高景生 (355) |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

王秉忠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是新兴的和填补空白的研究项目，起步较晚。进行有系统有组织的研究则始于1986年10月。它的标志是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和总编室的成立。迄今虽不足5年，且人力、财力有限，但仍取得显著成效。除了三省编写组成员个人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外，总编室集体攻关项目亦陆续问世。其中《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50万字，1938年完稿；《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已经出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三省各一册，初稿均已形成；《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多卷本已开始着手撰写。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大家共同遇到了一些很棘手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现仅就这些经常碰到并必须正确处理几个主要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关于奉系军阀问题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中，最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奉系军阀问题。虽然有人反对称奉系为军阀，笔者仍坚持奉系是个军阀集团。奉系军阀与“九·一八”事变有直接关联，研究东北沦陷十四年史首先须要研究“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这就要追溯奉系军阀对东北的统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

装侵占东北，固然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和实现向外扩张既定国策的必然结果，但和1931年前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东北当局内部状况有关。奉系军阀在它崛起、发展、夺取东三省统治权的过程中，长期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它的直接后果却是引狼入室，使日本势力得以在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渗透，给东北社会变化以严重影响。在政治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东北，日本势力逐渐地由经济领域深入到东北三省各级政府之中。日本人利用做军事、警察和私人顾问的机会，掌握东北各级政府的权利。他们强迫东北当局不仅在奉天督军署聘用日本顾问，在黑龙江省、吉林省督军署也聘用日本顾问。为此事，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中将曾派他的参谋长福田雅太郎少将到沈阳邀满铁公所副所长镰田弥助（后来升为所长）会见当时奉天督军张锡奎，对二十八师到期解聘渡赖顾问一事，提出所谓的“抗议”，迫使张锡奎屈服，答应各省督军署都聘任日本人做顾问。张作霖总揽东北军政大权之后，不仅继承了张锡奎、段芝贵的做法，聘任菊池和町野做他的军事顾问，而且当成“心腹”予以信任。

张氏父子不仅在奉省聘任日本顾问，在吉、黑两省军署和某些部队中亦聘用日本顾问。如吉林督军署日本顾问有铃木美通、大迫通贞中佐；黑龙江省督军署日本顾问有斋藤中佐。这些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坐探。“自1913年到1931年，十九年间，张氏父子先后聘任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和警察顾问各1人”。^①这些顾问在“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进攻东北中，大都是日本侵略军中的重要指挥人员，如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本庄繁，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在军事上，“九·一八”事变前夕，不仅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包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在乡军人等，驻扎并控制“租借地、满铁附属地”等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还有多达30~50万日本

武装移民，战时都可成为军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满”宪兵队、海军陆战队、特务警察队等，已经遍布全东北，一旦战争爆发，在东北各地的日本武装人员，都会行动起来。而且“租界地”、“满铁附属地”已经成了“国中之国”，拥有一切独立的权利，不受中国任何约束。

在经济上，“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控制了东北的主要铁路、矿山、森林、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霸占大量土地并利用剩余资本，对东北进行有抵押的“贷款”。而东北军阀所抵押的东西，皆是国家的主权和工厂、矿山以及重要资源宝藏。自1916年到1927年的11年间，东北军阀当局向日本有抵押借款计有20项，直接向日本借款额15086000元；借款人为张作霖、吴俊升、鲍贵卿、王永江等，均是奉系军阀首脑；其抵押条件是中国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银行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收入和这些部门的本身。

这些借款以铁路、矿山、森林为主。其中东北铁路借款7710万元，占日本对东北其他方面贷款的66.9%；其次是对矿山、森林的贷款。不仅如此，还通过对企业的投资和所谓的“中日合办”，设银行、发钞票等方式进行侵略。截止193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17.56亿日元，^②其中东北占62.9%。从1922年至1926年间，日本在东北开设的工厂有229家，^③每年从东北掠夺的矿业资源，仅煤炭值就有2950万元，铁矿值246万元，原铁值840万元，加上其它方面总值为3.58亿元之多^④。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控制东北的铁路有：南满铁路、四洮铁路、洮昂铁路、溪碱铁路、天图铁路、吉敦铁路、金福铁路和满蒙敷设五条新路等，全长约为3000公里，每年盈利达350多万元；还控制了东北渤海、黄海的航行权和东北的邮电事业，在东北设立的邮政局、分局、代办所等达125处之多；东北森林采伐权亦被日本人掌握，他们设有：鸭绿江采木公司、东洋采木会社、满铁木材会社、三井物产会社、大西库活制木材公司、裕宁

木业公司、日华丰村公司、兴林公司、富宁公司、黄川公司等数十家，投资额达2700余万元，每年大批木材源源外流到日本，疯狂地破坏了东北森林资源；掠夺东北的渔业资源，仅从事掠夺渔业的人员就有3万余人，1万多只渔船，年获利可达1000万元之多；控制了东北的矿业。日本在东北地区经营煤矿有20余处，铁矿3处、铜矿2处、铝矿2处、磁矿1处，共28处，投资额为2700万元。^⑤

强占东北大片土地。计有：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不包括“满铁”附属地），面积约有11000平方里；人口为6,499,862口；其所谓租借地有：营口、安东、奉天、铁岭、开原、四平、长春等；开设的商埠地有：奉天、大东沟、凤凰城、辽阳、新民、通江口、铁岭、法库门、吉林、长春、哈尔滨、宁古塔、琿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瑗琿、满洲里、局子街、龙井村、头道沟、百草沟以及日本铁路的附属地。^⑥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对东北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掠夺与垄断，军事上的布署与进入，都是已经既成的事实了，武装占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这些都是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期间进行的。

尽管如此，目前对奉系军阀，特别是对奉系军阀统治集团的头目张作霖及其该集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看法上仍有较大争议，均需以史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以正确的评价。不管如何争论，铁的事实明确告诉人们，奉系军阀和中国北洋军阀中的其他军阀一样，同样具有：对内镇压、剥削、压迫人民；对外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共同特性。这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不能改变而必须清醒认识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张学良的研究

这是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中首先涉及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一历史评价举世公认，

无庸质疑。当然这是对他一生的总评价。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与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是不完全相同的，“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用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思想、行为来说明和解释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对张学良研究方面，当前存在的问题或者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应负的责任；二是对张学良实事求是的研究与统一战线政策的关系。

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问题上的责任问题。当前史学界不少人，甚至在史坛上很有影响的个别权威人士，为适应某种需求，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难以令人苟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低估了东北军事力量 and 人民武装力量，错误认为东北“一隅之地”没有抵抗的条件，提出“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他忠实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即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①致使东北沦丧，这一历史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段历史，并不影响张学良将军的光辉形象。但是现在确实存在不要如实提这一段历史的倾向，一些人认为提这段历史会影响统战和台湾回归祖国。认为这是“重大政治问题”。于是压制了学术争论，甚至出现在学术讨论中大发雷霆，离开会场等不正常的学术空气。对此，我们必须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为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全国抗战”论的观点，做深入探讨。1931年9月19日午夜1时，张学良在接到荣臻的电话和皓电之后，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重要将领会议，在会上他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

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本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⑧这个“全国抗战”的观点，从字面上看是没有错误的，实际是主张抗战有条件论，是受蒋介石民族失败主义观点影响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之所以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皆由他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看不到东北军和人民的力量以及愚忠听命中央、听命上级的思想造成的，蒋介石是国家的领导，是他的上级，张学良军人气质很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对他做为信条来执行的，正像他后来在一次向群众讲话时说的的那样：“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⑨1928年东北易帜后，他就开始听命蒋介石的调遣，将东北军部分主力调入关内，参加中原军阀混战，以致东北军事力量呈现空虚和薄弱，给日寇武装进占东北以有利机会，尽管如此，东北也并非毫无抵抗能力。“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驻军总共有19万多人（其中：辽宁省驻军6万人，吉林省驻军8万人，黑龙江省驻军5万人）；驻东北的日军连同警察，铁道守备队等非正规军加在一起，总共仅26,882人，（其中正规师团14,760人，铁道守备队5,400人，辎兵先遣队2,561人，飞行队1,110人，铁道界内警察1,483人，领事馆所属警察3,051人）。^⑩

而且，日军正是抓住了东北军调动之机而发动武装进攻东北的。当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被日军侦悉后，日本侵略军便肆无忌惮地敢于提前冒险。这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史东北沦陷史必须弄清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日军活动时间表。日本人决心在东北有所行动，那是确定的，时间表的移动，是临时的处置”。^⑪1931年6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东北，秘密指派陆军省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

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分析形势，研究对策。6月19日，拟成了《对满蒙方案》以后又在五课长会议上一再讨论，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8月中，参谋部作战课长今村均也参与讨论。7月，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来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实际上，它已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②。

这个“行动纲领”称：“如果排日行动再发展下去，也许终于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春（1932年——作者注）为止，要求切实实施。”^③关于武力占领满蒙之主张，“东京军部少壮派与关东军少壮派，虽无不同，而于处理步骤与时期，则彼此大异”^④。他们在对待发动武装侵略东北的时间问题上，分歧很大，东京军部既担心苏联的反应，又怕若内阁阻遏，主张作好国内外舆论准备；而以关东军内部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代表，主张“国外先行论”^⑤。在日本内阁、军部与关东军对发动事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张学良于1931年9月6日为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给东北军发了“鱼秘”电报。这是促使日本关东军，敢于在9月18日发动事变的直接因素。

张学良于1930年11月离沈去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随即留驻北平。后因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久不返奉。在1931年夏秋之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发生中村事件，中日间气氛日趋紧张，尤其到9月初旬，南满附属地一带日军军事活动异常，发动武装侵略的迹象明显。这时，不仅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不在任内；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紧随去平不返；吉林省督军张作相亦离职去锦州为父奔丧。在此关键时刻，东三省军、政各界群龙无首，不仅军事上毫无准备，其军事设施亦多废弛。而日本关东军少壮法西斯军人挑衅活动，却猖狂无忌。对

此，代行张学良工作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曾多次给北平打电话，向张学良汇报沈阳情况。张学良于9月9日给荣臻和东三省政务委员臧式毅，分别打来电报，其内容：“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⑩荣臻收到电报之后，立即将原电油印下发有关部队，臧式毅接到这项电令，赶忙找荣臻商量，请荣口头密告各部队，强调千万不能公牍下发，可是，这时已经晚了，荣臻已经将油印的张学良原电发出去了。日本在满特务机关，向来注重搜集东北各署的电报、公文，甚至对各官署制字纸笺，都出高价收买，而这项密电早已被日本在满特务机关截获。关东军少壮法西斯军人，立即活跃起来，增加了即刻冒险行动的勇气，认为机不可失。

在日本国内的“樱社”头领桥本欣五郎，获悉这个消息后，急不可待，立即利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互相联系的电报密码，三次打电报给板垣，说：“国内不用担心，立刻坚决行动。”^⑪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道一段路轨，诬为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一小时以后，由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即铁路守备队）约500名，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另一路由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向沈阳城内进攻，“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不能说张学良没有责任。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内、外原因，对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由对张学良研究中碰到的问题看出，研究历史，特别是与现实政治联系比较紧密的现代史研究，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即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历史与政治是统一又不可分割的，归根结底历史要服从政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原则与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并不矛盾，历史长河是无限长的。

并不等于一切历史的东西都可以原封不动的，在一个时间里都直观的反映出来，必须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确定今天该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有许多历史事实，不宜今天讲，需10年或20年以后再反映，这也是正确反映历史，正如对张学良的研究上，确有些不适于今天讲或不适于某一个场合讲，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场合，这就是现实政治的要求，如果确实不利统战，要考虑场合和时间，这也正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要求，究其根底，历史与现实政治是一致的，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并不是要求违背历史真实，或歪曲历史，而是要根据现实政治需要，选择时间与场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张学良研究即应如此。

三、关于东北沦陷十四年的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的问题

日本侵占台湾50年，侵占旅大40年，侵占东北14年，英国侵占香港99年，这几个地区这些年均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殖民地史特别是殖民地经济史的研究，总的说还很薄弱，既使有一些研究，分歧也比较大。对东北殖民地经济的研究，不仅涉及了中国史学工作者，还涉及到日本史学界和日本殖民者本身。日本殖民者和一些日本史学工作者，最典型的观点是侵略“有功论”，认为日本殖民者“开发”了东北，使东北现代化了。当前进行的四个现代化进程中，东北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基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14年中奠定的。如《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大连史》以及一些中国人，从蒋廷黻到刘小波都主张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带来了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基础；带来了现代文化与文明，甚至有人在报上撰文宣传他们的观点，这直接影响和干扰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如《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序言中写道：“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接收了帝俄在满洲的各种权益。当时的满洲，是名符其实的塞北荒原。到了1945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将它归还中国时，这片昔日的荒原已经变成拥有许多现代化城市，在东洋也算得上屈指可数的现

代化工业地区了。”并说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日本人的技术和努力（姑且不谈其动机），所起的主导作用也是历史的事实”。他们目的在于肯定日本殖民者的“功劳，”把它描绘成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们怀着理想与热情从事工作，率先引进了日本尚未具有的各种先进制度和设备，从而给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文化”，历史的实际却非如此。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早在鸦片战争前民族工商业在东北已经萌芽，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东北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相当发展，在张作霖主政东北的时候，东北的经济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由于他自主地不完全屈从日本来发展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和民族经济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抗衡，最后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在对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看法上，既应看到其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应看到其自主发展民族经济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面。实际上东北的工业基础正是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奠定的，东北并非是塞外荒原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张作霖主政东北后，任用理财能手王永江，整理财政，倡导实业；开源节流，几年间省库充裕，自由地发展民族经济，到20年代新兴的近代民族工业，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有些已初具规模了，如：奉天纺纱厂，创设于1923年7月，资本300万元，从美国购进200架比较先进的纺织机；1923年由杜重远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打破了省内建筑所用的新式砖瓦为日商所垄断的局面，后改制瓷器，到1930年竟达到年产800余万件，销路极为畅旺，使日本瓷器严重滞销^⑩。1924年杨宇霆出资兴办的大亨铁工厂（现在沈阳矿山机械厂前身），设备先进，有机器80余台、钢钳百余座、铁炉8台、起重机8台，可生产水管、铁路车辆，还附设酸素厂，有工人600余人，规模宏大，此外还有皇姑屯修车厂（现沈阳机车车辆厂前身）以及万顺、永兴等中小铁工厂三四十家。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出于穷兵黩武向外扩张的需要，极力发展军事工业，客观上使东北军事工业发达，居当时全国之冠。1921年张作霖下令正式创办兵工厂，向丹麦兵器公司购买设备，后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厂内先后扩建第一、二枪弹厂；第一、二炮弹厂；第一、二枪厂、装炮场、火药厂、炼钢厂、发电厂、化验厂、木工所等。不惜花大价聘请日本技师和从中国上海、汉阳兵工厂招来的中国技师，到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能制造出数种炮和炮弹、步枪、机枪子弹，是国内一流兵工厂。其他工业部门如缫丝、火柴、榨油、印刷、酿造、烟草等制造与加工业也相当发展。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为了与日本竞争，在铁路建设上更为突出。在原有3条主要铁路：京奉（英、日借款修筑）、吉长、四洮，是日本借款修筑的，其名曰“国有”，实际是徒具虚名，实权为日本人控制。自1924年以后，在奉系军阀的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大规模兴修铁路，自主筹集资金，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股商办向民间募集的办法，先后修筑10条主要铁路：奉海铁路（奉天至海龙），长251公里，1924年7月开工，1927年8月完工通车；打通铁路（由京奉路打虎山站至通辽），是京奉路支线，全长250公里；吉海铁路（由吉林省城至朝阳镇），全长185公里；呼海铁路（黑龙江省呼兰县松浦镇至海伦），全长220公里；齐克铁路（由昂昂溪经齐齐哈尔至克山）全长200公里；蛟奶铁路（自蛟河至奶子山煤矿）是煤矿运煤的专用线，全长10公里；洮索铁路（自洮昂路洮安站至索伦），全长170公里；鹤岗铁路（从鹤岗矿区至松花江下游莲江口），是运煤专用线，全长55公里；吉敦铁路（自吉林至敦化），全长360公里。洮昂铁路（自洮南至昂昂溪）全长220公里。在修这些铁路过程中，受到日本多次干涉与阻挠，如修奉海铁路时，允许日本人包修洮（南）昂（昂昂溪）路为条件，才得以开工，建成后日本人又强迫与“满铁”实行联运，遭拒绝后，以切断对关内奉军的军火供应相威胁，被迫签订了与“满铁”实行联运的协定；在修筑吉海路时，日本以违背“满蒙五路协

定”为名提出抗议。这几条铁路的修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种种干扰、阻挠中完成的，为了争取客货运量，提高与“满铁”竞争的地位而广泛实行联运，最先是沈海路与吉海路实行联运，主要是为了与“满铁”竞争。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经济建设带有明显半殖民半封建性质，每兴建一个工厂，修筑一条铁路，开采一个矿山，建立一个银行都处处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奉系军阀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条件下，相对独立自主发展奉系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他们从统治的需要，剥削的需要进行每一项建设的，客观上确实发展了东北经济。不管从什么角度和什么目的发展东北经济，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经济大大超过奉系军阀统治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是在没收和接管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并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采取“高速”发展东北的殖民地经济。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奠定的，绝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功劳”，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也绝非是一片荒原。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攫取东北的各种特权后，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腥风血雨的四十年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所谓“开发”，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疯狂掠夺，逐步使东北殖民地化的过程。在这个时期东北的经济有些发展的话，亦是东北劳动人民用血汗、生命换来的，受益者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利用东北的人力、财力及其资源，剥削东北人民，再把剥削得来的资金又重新投资到东北，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日本的投资所获利润，除了少数用于扩大再生产（为了他们获得更多利润）外，主要是把所得的利润汇至日本国内。自1932—1936年汇往日本的利润达55,302万元；1937—1944年竟达279,800万元。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期间给殖民地的东北，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近代化和近代文明与文化，这是日本侵略者在被侵占的中国土地上实行日本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并非中国资本主义

的近代化。这种日本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不仅存在阶级压迫，而且存在着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受益者是日本侵略者不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殖民地文化与文明是一种奴隶文明。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绝无功绩可言，东北近代工业更非日本侵略者所奠定。这是正确进行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注

- ①《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85页。
- ②孔经纬：《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第124页。
-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33—434页。
- ④⑤《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15页。
- ⑥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第255页。
- ⑦陈本善等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11页。
- ⑧洪飏：《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第六辑。
- ⑨《西安事变史资料选》，第352页。
- ⑩《东北军史》，第193页。
- ⑪《“满洲国”纪实》，第66页。
- ⑫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写：《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2—13页。
- ⑬日《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1964年版，第194页。
- ⑭梁敬淳：《“九·一八”事变史述》，第一章，第3页。
- ⑮《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一卷，第389页。
- ⑯《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88页。
- ⑰日《桥本大佐手记》三长官会议，建川第一部长。
- ⑱张德元：《东北民族工业一支花》（油印稿）。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原因探讨

庄 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本文旨在探讨发生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一、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为了维护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依据各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但“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①，当他们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变化时，就势必导致一场新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本已呈现发展不平衡的趋势，而1929年开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的“平静”和暂时均势，开始了世界新动荡。

首先，从生产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使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显著提高。然而它的工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航空、化学、汽车、电气等部门进展很快，冶炼部门产量下降，采煤、纺织等部门停滞不